



西漢名將趙充國

郭志坤
王铎全

西汉名将赵充国

郭志坤 王铎全

福建人民出版社

西汉名将赵充国

郭志坤 王铎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五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75印张 插页 82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950

书号：11173·44 定价：0.35元

序 言

赵充国是西汉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重要人物。作为军事将领，他既英勇善战，又不盲动冒险，能把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很好地结合起来。作为政府的大员，他当然是效忠于皇室的，但他并不一味愚忠，更不逢迎谄媚。相反，他颇能坚持自己的见解，在皇帝面前讲些直话，甚至能以理服人。例如在西北设屯田军一事，赵充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昧死陈愚”，最后用事实说服了汉宣帝和朝廷官员，使他们称赞屯田是“计善”。事实上，屯田确实起了防止匈奴和羌人贵族攻扰边境的作用。赵充国的屯田措施常为后来有作为的帝王所仿效或称赞。曹操募民屯田，得谷百万斛，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得以兼并群雄。宋人《东汉会要》作者徐天麟曾对此评论说：“屯田之利，其博如此”，“籍此以为征伐之资，可不鉴哉！”屯田也是保卫边疆的重要谋略，当年朱元璋就采纳了“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的建议，广设屯田，在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接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认为屯田是国治“长久之法”（《明史记事本末》卷之十）。屯田还是开通西域的“护路队”。屯田一开，西域即通，屯田废置，西域便塞。《后汉书·匈奴传》写道：“以屯田，遂通西域”。可见，赵充国的屯田计，确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李贽在评论赵充国时说：“屯田是千古之策，惜行者之非其人”（《史纲评要》）。

对于赵充国其人，在当时也是有人非议的。开初，是由于没有完全认识赵充国屯田谋略的缘故；尔后，又由于他的功绩和耿直敢言的性格，受人猜忌和怨恨，其子被害至死。然而，不幸和灾难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历史最公正，一个人

只要作了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后人是不会忘记的。不是吗？在赵充国死后一年，为了表彰他的功德，乃图画其人于未央宫麒麟阁上，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位列丞相之前，居第三，足见赵充国在汉代的地位。汉成帝时，西羌有警报，又“思将帅之臣”，举行悼念赵充国的活动，召来了黄门郎、汉代著名文学家杨雄在赵充国的画像旁题了颂词，词中说：“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赵充国是一位机智沉着、富有军事经验和策略思想的大将。毛泽东同志也很推崇这一重要的历史人物。记得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在北京开会，有一天，毛泽东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中南海晤谈。一到中南海，只见毛主席正在露天游泳池旁的帐棚下看书。他拿着一本大字本的线装《汉书》，翻开第六十九卷《赵充国传》其中有一段说赵充国“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毛主席指着这一段，亲切地对我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意见，在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后来相反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毛主席合起《汉书》，又继续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是现在。可见研究赵充国其人，是很有意义的。一九七八年年底，郭志坤、王铎全两同志访问我时，从我引述的毛主席的话中得到启示，开始研究赵充国，现编著《西汉名将赵充国》一书，是很可取的。

书中把人物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来写，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叙述了赵充国的活动事迹及其品德精神，既忠实又生动，颇能把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汉帝国与匈奴、

特别是与西羌的关系，如实地勾画出来。全书材料以《汉书·赵充国传》为基础，并参照其他人物传记及有关史籍，从头到尾，信而有徵，文字清楚，通俗易懂，情节起伏，也很感人，既是一项专题史的研究，也是一本好的历史故事书，同时于爱国主义教育也很有帮助。匆率草此，即当序言。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周谷城

目 录

序 言	(1)
一、青少年时代	(1)
匈奴为患	(1)
抗匈烽火	(3)
练骑射和学兵法	(7)
从骑士到“补羽林”	(10)
二、在战斗里成长	(12)
锋芒初露	(12)
武帝召见	(14)
屡建战功	(15)
三、参与政事	(19)
与霍光谋废	(19)
封爵营平侯	(21)
威震匈奴	(22)
四、制羌谋略	(24)
羌人谋反	(24)
“毋令解仇”	(25)
“行边兵，预为备”	(27)
安国乱谋	(28)
五、率兵平羌	(30)

充国自荐	(30)
“兵难踰度”	(32)
踏上征途	(33)
坚守不出	(35)
六、先政治后军事	(37)
释放雕库	(37)
非武贤计	(38)
献保胜策	(41)
七、几场论争	(44)
先后之争	(44)
急缓之争	(47)
擒放之争	(49)
八、酝酿屯田	(52)
初 计	(52)
拒 劝	(54)
九、一上屯田计	(57)
坚 持	(57)
上 书	(59)
十、二上屯田计	(62)
宣帝质疑	(62)
“言十二便”	(64)
十一、三上屯田计	(67)
宣帝再问	(67)
三复斯言——“兵以计为本”	(69)
百感于一——“匈奴不可不备”	(72)
昧死陈愚	(74)
十二、屯田中的工程	(77)

群臣赞计·····	(77)
修缮乡亭·····	(79)
建造桥梁·····	(81)
凿井浚渠·····	(82)
十三、振旅而还·····	(85)
高奏凯歌·····	(85)
直言兵事·····	(87)
设置属国·····	(88)
十四、志不衰，骨不朽·····	(91)
上书易诏·····	(91)
爱子遇难·····	(93)
告老休养·····	(95)
十五、青史留名·····	(97)
上壁画·····	(97)
题颂词·····	(99)
附录一：赵充国年表	
附录二：宣帝与赵充国往来的书信	

一、青少年时代

匈奴为患

赵充国，字翁孙，生于公元前一三七年（西汉武帝建元四年），是西汉时期有名的武将。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匈奴为患的时候。

匈奴，是我国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自从西周以来，经常在北部边境进行抢掠活动，对当时的周政权以及后来的赵、燕、秦等国，构成颇大的威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看到匈奴寇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曾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迫使其北退七百余里，并攻取河套一带广大地区，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①。为了巩固北部边防，秦始皇又征调大批民伕，将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向东、向西延伸，筑成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的“万里长城”，防备匈奴的骚扰。

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匈奴的势力又逐渐强盛起来。匈奴奴隶主贵族见当时中原地区的战争接连不断，边防废弛，便乘机向南扩展势力，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公元前二〇一年（高帝六年）秋，匈奴王冒顿单于统率一二十万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汉驻守在马邑的韩王信竟投降了匈奴。

^①贾谊《新书·过秦论》上。

这样，匈奴贵族的气焰更为嚣张，引兵进一步越过句注山（今山西原平县北面），攻陷太原，前锋直达铜鞮（今山西沁县南）。汉高祖刘邦想用武力解决匈奴的威胁，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军队出征。由于求胜心切，加上侦察失误，孤军深入，竟中了冒顿单于的埋伏，被围困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山上达七天七夜之久，处境十分危险。后经随军谋士陈平献计，用珠宝买通了单于的阏氏（yān zhī，音烟支，即妻室），放一条逃生之路，才得以脱围。这就是历史上的“平城之围”。

平城的失败，不仅未能解决匈奴对边境地区的骚扰，反而使北部边境人民受到更为严重的蹂躏。史载“匈奴冒顿数苦北边”^①，说明匈奴贵族的骚扰有增无减。但是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由于经济尚未得到恢复，内部的统一也还极不巩固，在这种情况下，要给正在强盛起来的强悍的匈奴以有力的反击，并不具备条件。因此刘邦采纳了刘敬（原姓娄，赐姓刘）的“和亲”建议。自此以后，一直到文、景二帝的数十年间，基本上都奉行这一政策。

所谓“和亲”，就是汉政府把公主嫁给单于，作为单于的阏氏，并约定每年送去大量的丝织品、粮食、币帛和酒等财物。与此同时，开放边境一些地方作为关市，互通贸易。按照刘敬的设想：既然汉天子的公主做了单于的阏氏，单于就成了汉天子的女婿，他们的儿子就是外孙了，而女婿和外孙是不会攻打岳父或外祖父的，这样就“可无战以渐臣也”，即“不战而臣”。其实，“和亲”有时虽然能够暂时缓和一下汉政府与匈奴贵族的矛盾，但绝对满足不了匈奴贵族的无底欲壑。匈奴贵族一方面对西汉政府送去的公主、嫁妆以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下》。

大量的财物照收不误，另一方面仍然掠夺成性，只要一有机会可乘，就攻掠汉边，虏去人口，抢去牲畜。其中规模较大、为害较为严重的有：

公元前一六六年（文帝前十四年），匈奴单于率“十四万骑入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环县东南）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侦察骑兵甚至到达离长安仅二百里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南）和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

公元前一五八年（文帝后六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三万骑入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公元前一四四年（景帝中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今山西右玉县南），至武泉，入上郡，取宛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此外，公元前一二九年（武帝元光六年）、前一二八年（元朔元年）、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匈奴贵族的袭扰规模也较大，而且次数多，危害严重。史书上常有“匈奴数盗边”、“杀略吏民”等记载^①。

匈奴的攻掠和骚扰，成了西汉政权的重要边患，严重地影响了西汉西北地区人民的安宁和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抗击匈奴。

抗 匈 烽 火

公元前一四一年，景帝死，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武帝在文、景与民休养生息、国力渐强的基础上，一

^①见《汉书·匈奴传》及《汉书》中的《文帝纪》、《景帝纪》和《武帝纪》。

方面继续发展生产、繁荣封建经济，巩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正视当时日益激化的与匈奴贵族的矛盾，并积极着手准备抗击匈奴的斗争。

公元前一三三年（武帝元光二年），匈奴又一次大规模进攻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一带，进行抢劫和烧杀。面对匈奴贵族这种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行为，汉政府是否继续奉行“和亲”政策？武帝将这一问题交给群臣讨论。其实，这在两年之前当匈奴单于来请“和亲”时，武帝就已“下其议”，让大家讨论过一次了。那时，担任大行（执掌接待少数民族事宜的官吏）的王恢曾经指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认为匈奴贵族一贯背信弃义，不守信约，“和亲”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应该给予强有力的反击。御史大夫韩安国则指出匈奴逐水草而居，来去迅速，行踪飘忽，认为“难得而制”，所以“不如和亲”。他的意见得到其他许多大臣的附和，结果“上许和亲”^①。两年后重新讨论，仍然是以王恢和韩安国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汉武帝本人通过多年的实践，对匈奴贵族的贪得无厌已有一定的认识，他在提出问题交群臣讨论时就指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并基本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问：“今欲举兵攻之，何如？”王恢将武帝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极力主张“击之便”。而韩安国则仍然坚持过去的意见，认为“勿击便”^②。论争的结果，武帝采纳了以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

①《资治通鉴·卷十七》。

②参看《汉书·韩安国传》。

的意见，罢“和亲”，改出击，揭开了抗匈斗争的序幕。从此以后，发动了多次抗击匈奴贵族的战争，其中主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这年春天，匈奴又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一带，“杀略吏民千余人”。汉武帝派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发，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往东，而往西，一直越过陇西，杀入河套地区。盘踞在这里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见势不妙，仓惶逃命，汉政府一举收复了河南旧地（即河套地区）。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因为河套地区有大片草原沃野，加上水源充足，是个很理想的牧场，兼之它背靠阴山，地势险要，是个战略要地，汉政府收复了这一地区，不仅使匈奴失去了一大片肥美的牧场，而且隔绝了匈奴中部与左右翼的联系，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同时，这一仗还带有战略转折的意义，西汉抗击匈奴贵族的战争，从此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武帝在这一仗之后，又采用了主父偃的意见，在收复的地区，设置了朔方郡，并派苏建征发十多万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①，还移民十万，到那里屯垦实边，加强了边防的建设。

第二次对匈奴的战争是在公元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即河西之役。河西走廊，地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交，祁连山与合黎山南北并峙，中间地平低落，成一天然走廊，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要道。同时因其地北临匈奴，南有羌人，东南通关中，西北连西域，军事形势也十分险要。长期以来，匈奴占有河西，使汉与西域的交通受阻，同时对汉的西

^①《资治通鉴·卷十八》。

部边地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收复河南旧地之后，武帝又派青年将领霍去病率军收复河西。霍去病先后两次主动出击，歼灭了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大批有生力量，最后逼使浑邪王不得不杀了休屠王，并带领数万匈奴兵降汉，从此，“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兰州附近）、河西并南山（即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①西汉与西域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被切断，汉政府的西部局势也进一步稳定下来。

第三次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在公元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进军漠北。所谓漠北，指的是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沙漠以北，当时，那里是匈奴的根据地。西汉叛将赵信在河西之役以后，眼见得匈奴元气大伤，便给单于出谋划策，建议将主力全部转移到漠北，妄图以逸待劳，伺机反扑。武帝看穿匈奴这一意图，为了不留后患，在河西之役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出击。经与众将商议，决定进军漠北。既然漠北是匈奴的老巢，这一仗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武帝宣布“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②，就是说要大获全胜，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行。这次由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五万精锐骑兵，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代郡两路出击，进行合围。这两路大军，如风驰电掣般席卷了浩瀚的沙漠南北，出塞达二、三千里，共歼灭匈奴军近十万人，匈奴主力基本上被打垮了。这次战役，给匈奴奴隶主贵族以最大的打击。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③。

从收复河南旧地到进军漠北的胜利，前后用了十四年的时间。这正是赵充国五岁到十九岁的青少年时期。

①《资治通鉴·卷十九》。

②③《资治通鉴·卷十九》。

练骑射和学兵法

赵充国原籍陇西上邽（guī，音龟，县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他的家世不详。一九四二年，青海出土东汉三老掾赵宽碑，光和三年（公元一八〇年）刻。赵宽是充国的后代，碑中叙述世系十分详细，现将碑文摘录于下：

“其先系出少皓，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弟君育生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为汉名将，封邑营平。”^①

由此可知，赵充国的父亲君育就是在上邽出生的。西汉初期，这里是边陲之地。它的东南，是氐人聚居的地方，西北则是匈奴和羌人活动的场所。为了加强边区的防卫工作，汉政府曾多次从内地往边区移民。在这些移民中，除了少数“家世清白”而又有财产的人家之外，绝大多数是奴隶和罪犯，以及部分从事医巫、商贾、百工职业的人。从赵宽碑文中可以看出，赵充国的祖上在文景时曾官至少府（掌山海池泽收入及皇室手工业制造事务），他的曾祖父也官至谏议大夫，所以赵充国的家庭出身当然是属于少数士大夫亦即官僚家庭。

汉武帝时，随着河南、河西两次战役的胜利，西汉政府所控制的地区逐步向北和向西推进。赵充国的家后来就从上邽迁徙到黄河河套以西的金城令居（县名，今甘肃永登县）。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入口，它的西边又紧邻羌人，所以是个十分紧要的地方。河西战役以后，汉武帝就在这一带开凿渠道，设置田官，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将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西延长到令居，以巩固边防。

^①转引自陈直：《汉书新证》1979年版第367页。

在边地出生又在边地长大的赵充国，对于匈奴贵族袭扰边区的罪行时有见闻，也听到许多汉政府出击匈奴的动人故事。汉朝名将李广，箭术高超，号称“飞将军”，也是陇西人，可以说是赵充国的老乡。在这种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很喜欢骑马、射箭，苦练骑射本领。

匈奴是个游牧民族，他们拥有许多强壮的马匹，过惯游牧的生活，能经风受雨，忍饥耐渴；他们自小就经受严格的骑射技术的训练，能边跑边射，机动灵活。要战胜他们，没有一支善于骑射的骑兵是不行的。汉武帝既然改变了“和亲”政策，派兵出击，就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作好准备。

首要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马匹。西汉建国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①，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可见当时的马匹是十分缺少的。但单靠步兵又怎能与匈奴的骑兵作战？早在文、景之时，已开始抓了大养战马的工作，武帝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单以公元前一一九年进军漠北来说，武帝除了派十万骑兵担任攻击任务外，还调集了十四万匹马担负后勤运输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战斗。大养战马的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有了战马，还要有大批训练有素的骑兵。武帝即位不久，就建置了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个校尉，担负训练骑兵的工作，特别是从地主阶级子弟中挑选部分身体健壮的进行骑射技术的训练，作为骑兵的骨干力量。从前面提到的三次对匈奴的重要战争的情况看，一支能骑善射，经得住长途行军、连续作战的骑兵也正在成长起来。

有了战马和骑兵，更需要有一批能领兵用兵、能征善战并精通兵法的将领。武帝对这一点也十分重视。他不但起用

^①《汉书·食货志》。